

全球化浪潮與東亞區域發展

蔡東杰*

摘要：

自從 1950 年代的民族自決風潮以來，位居東亞的大多數國家不僅重獲其國際獨立地位，在經濟發展方面亦有著極亮眼的表現，甚至還積極地加入了風起雲湧的「全球化」進程。在此，本文除簡單釐清所謂全球化的相關概念外，同時企圖由更長遠的「大歷史」脈絡與觀察角度，以及新航路發現、工業革命與帝國主義、解殖化浪潮、科技革命與民主化等變數的分析，分階段重建東亞自 16 世紀以來，透過「歐洲化」或「資本主義化」形式以緩步加入現代「世界體系」的過程；一方面藉由對其間挑戰與回應的整理，釐清東西方間的實際互動關係，同時也希望以此對東亞的未來發展做出評估與預測。

關鍵詞：東亞、全球化、資本主義、工業革命、全球體系

*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助理教授。
本論文經匿名審查通過，同意予以刊載。

一、前言

自從 1960 與 1970 年代起，所謂「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 或「全球化」(globalization) 的字眼便開始成爲一種流行措詞，並始終與成功以及財富聯繫在一起。¹至於若干東亞國家在經濟發展上所取得的驚人成就，更使其成爲某種具有解釋力與預測性的理論，從而在相關研究學者間凝聚成一種共通的觀察視野。儘管如此，所謂「全球化」的意涵還是相當引起爭議的；若干學者認爲，對於該名詞的論點最少來自三種觀點：²首先是如大前研一等「超全球主義論者」(hyperglobalizers)，³他們認爲，作爲傳統國際行爲者的民族國家，其所擁有的權力與權威正逐漸轉移給全球性的制度與公司，⁴更甚者，由於經濟全球化所形成的「鐵籠」(iron cage) 效應，更使國內政府在社會福利與經濟調控方面的獨立功能大打折扣。⁵其次是由赫斯特 (P. Hirst) 與湯普森 (G. Thompson) 等人所代表的「懷疑論者」(sceptics)，他們認爲這波全球化其實起自於 1860 年代，由於現代工業技術的普及，於是帶來一股經濟國際化的風潮，其結果雖拉近了民族國家間的距離，但是從某個角度來說，政府效能並不因此而遭到削弱，甚至目前國際經濟的開放度還不及 1870 至 1914 年間。⁶最後，則是由紀登斯 (Anthony Giddens) 等人主張的「轉型理論」(transformationalism)，他們認爲就現階段而言，全球化乃是重塑世界秩序的

¹ see G. Modelski, *Principles of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Free Press, 1972) ; G. Waters 也認爲相關名詞起自 1960 年代後，見 *Global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5) , p.2.

² David Held, Anthony McGrew, David Goldblatt, and Jonathan Perraton,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London: Polity Press, 1999) , p.3.

³ 代表作如大前研一 (K. Ohmae) 的 *The Borderless World* (London: Collins, 1990) 與 *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5) .

⁴ Francis Adams, Satya Dev Gupta and Kidane Mengistead, "Glob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ing World: An Introduction," in Francis Adams, Satya Dev Gupta and Kidane Mengistead, eds. *Globalization and the Dilemmas of the State in the South*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 p.1.

⁵ R. Cox,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Limits to Liberal Democracy," in Anthony McGrew, 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Democracy: Globalization and Territorial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7) , pp.49-72.

⁶ Paul Hirst and Grahame Thompson,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Governa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9) , p.2.

主要動力，換句話說，處於目前體系下的國際政治經濟制度正被賦予一股遽變的力量，⁷對此，政府應「超越左右」(Beyond Left and Right)以走出「第三條路」(The Third Way)。此外，全球化也可能帶來三種效應，亦即增加投資並帶動創新行為的「擴張效應」，由新的世界經濟組織針對相同資源所進行的「配置效應」，以及藉由全球化得利所導致的「分配效應」；其中擴張效應可說是最重要的。⁸

在此，我們除企圖將對於全球化影響的討論集中在東亞這個區域外，同時也希望賦予所謂「全球化」一個更具操作性的定義；個人認為，所謂全球化應包括表面上的「擴張」(expansion)形式，「設法改變」(try to change)的政策目標，以及最終達成「轉型」(transformation)的結果現象。再者，儘管許多學者都認為全球化乃是 20 世紀中葉後才出現的趨勢，但仍有相當數量者支持法國學者布勞岱爾 (Fernand Braudel) 的觀點，亦即漫長的全球化歷程早已持續了數世紀之久；⁹本文不僅接受這種說法，亦進一步設法從大歷史的角度，將東亞地區與此種浪潮的互動關係，分為以下幾個時期來進行討論。

二、第一波：新航路與西力東漸 (16-17 世紀)

根據我們在前面所提出的操作性定義，所謂「全球化」過程可說是由歐洲人所啟動的，因此稱之為「歐洲化」(Europeanization)也無不可，至於第一階段的全球歐化過程則大致出現於 15 世紀到 18 世紀間。¹⁰在此之前的 11 世

⁷ Anthony Giddens, "Globalization: a Keynote Address," *UNRISD News*, 15(1996), pp.11-22.

⁸ John-ren Chen and Richard Hule, "Globaliz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Its Effects," in John-ren Chen, ed. *Economic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Ltd, 1998), p.9.

⁹ E. Helleiner, "Braudelian Reflections o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Historian as Pioneer," in S. Gill and J. Mittleman, eds.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¹⁰ Randall D. Germain, "Globaliz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Germain, ed. *Globalization and its Critics: Perspectives from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McMillan Press, 2000), p.72; R. Robertson,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London: Sage Publisher, 1992), pp.58-60.

紀至 13 世紀間，逐漸結束中古黑暗時代的歐洲（特別是西歐）正處於一個普遍的內部開拓過程中，除出現如新城鎮興起與人口迅速成長等現象外，君主權力的上升也使其得以動員更大的集體能量。¹¹由於經濟活動復甦所帶來的海上與陸上貿易顯著拓展，使得近海（地中海、波羅的海與北海）互動相當活躍暢旺，而銀行與金融業也隨之有著長足的發展。這些正面因素毋寧都有利於歐洲未來的對外全球性擴張。至於其最初動機則如王曾才所述：

十五世紀後期以來歐洲不斷對外擴張，有其經濟上和宗教上的動機，同時也有地理知識與航海技術等方面的憑藉。¹²

值得注意的是，在經濟動機方面，歐洲人最初擴張並非是爲了尋找拓展自己商貨的市場，而是希望找到其所需的進口物品。¹³其中，在早期貿易裡占重要地位的絲綢交易，已經由於歐洲本身紡織業的發展而漸趨式微，取而代之的則是來自於南洋群島（東印度群島）的香料。儘管時至今日，包括胡椒、丁香與肉桂等香料已成爲價格低廉的消費品，但在 14 世紀至 15 世紀時期的歐洲卻是用途普遍但售價昂貴的奢侈品；特別是因爲自 14 世紀中期起，歐洲廣泛流行包括黑死病在內的各種瘟疫，而若干香料更被宣傳具有治療疾病的特效功能，於是地位更是水漲船高。¹⁴在豐厚利潤的誘使下，首先由位居伊比利半島的歐洲人展開向東擴張的遠征旅程。

相對於歐洲正蓄勢待發的擴張姿態，15 世紀初期的東亞在政治上正處於鞏固以中國爲中心的「朝貢體系」（Tributary System）過程中，¹⁵而強化的動力則來自於 1405-1433 年間鄭和的 7 次遠航。不管其遠航的真正原因爲何，以南中國海與東印度洋爲主的海外行動，無疑擴大並鞏固了中國在此區的威望與國際地位，並使區域內多數國家接受了經過形式化的階層性國際體系。¹⁶至於

¹¹ see William McNeill, *The Rise of the West* (New York: Free Press, 1963), Chapter 10.

¹² 王曾才，《世界通史》（台北：三民書局，民國 82 年），頁 411。

¹³ David Arnold, *The Age of Discovery, 1400-1600*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83), p.35.

¹⁴ Giles Milton 著，王國璋譯，《荳蔻的故事》（台北：究竟出版社，民國 90 年），頁 26-27。

¹⁵ John K. Fairbank, "A Preliminary Framework," in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New Yor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1-4.

¹⁶ 關於以中國爲中心之朝貢體系的規範與內容，請參考蔡東杰，《中國外交史》（台北：風雲

在經濟上，則東亞此時正以中國和印度為兩個軸心，然後經過東南亞地區的媒介來進行貿易互動。¹⁷對中國來說，此際也是所謂「閉關」政策的開端；只不過與西方國家看法有所出入的是，中國並非封閉外人前來溝通的管道（此由朝貢行為可以看出），而是基於安全考量，禁止本國人的向海外發展。¹⁸至於東亞地區多數國家所以願意接受由中國所設定之體系規範的原因，也在覬覦因遵守規範而可獲得的經濟利益，正如濱下武志所言：

朝貢的根本特徵，在於它是以商業貿易行為所進行的活動，換言之，因朝貢關係而使得以朝貢貿易關係為基礎的貿易網絡得以形成。¹⁹

王曾才也認為：

東亞其他國家，則欲藉通商來分享中國的繁榮。……朝貢與通商為一體之二面：中國所重視者為朝貢的精神價值，朝貢國所追求者為通商的實際利益。……因此商業關係與通商關係是不可分的。²⁰

正當東亞以中國為核心而構成一個政治經濟互動頻繁的國際體系時，歐洲的向東擴張動力卻因受限於造船技術與地理知識而相當遲緩；²¹例如葡萄牙人達伽馬（Vasco da Gama）便在鄭和結束航行的 65 年後（1498 年）才得以越過非洲南端的好望角。至於維繫遠洋探險動力的精神來源則是所謂「三 G」：亦即福音（Gospel）、黃金（Gold）與榮耀（Glory）。藉由在 1511 年併吞麻六甲這個當時最繁榮的東南亞港口國家，首先具備擴張決心與可能性的葡萄牙不僅

論壇出版社，民國 89 年），頁 37-45。

¹⁷ 濱下武志，《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年），頁 10。

¹⁸ see Charles Hucker, "Hu Tsung-hsien's Campaign against Hsu Hai," in John K. Fairbank, ed. *Chinese Way in Warfare* (New Yor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275.

¹⁹ 濱下武志，前引書，頁 38。

²⁰ 王曾才，《中國外交史要義》（台北：經世文化事業公司，民國 82 年），頁 30。

²¹ 例如希臘學者托勒密（Ptolemy）在西元 2 世紀所寫的《地理學》（*Geography*）一書，與義大利人馬可波羅（Marco Polo）在 13 世紀所寫具想像成分頗高的《遊記》（*Travels*），都在 15 世紀初才為歐洲人所逐漸熟知。

取得在東亞的立足點，²²也開啓了歐洲各國在此區的貿易與殖民競賽；而西班牙人也隨即在 1521 年征服菲律賓作為前進亞洲的基點。²³不過，西葡兩國雖在東亞擴張行動中取得先機，但荷蘭與英國卻很快地便有著後來居上的姿態；後者不僅經常以武力壓迫此區域傳統君主以保障利益，更於 1602 年以結合資金的集體壟斷型態（東印度公司），有組織地擴張其貿易版圖。

值得一提的是，相較於歐洲人明顯的向東「擴張」行動，並透過通商貿易甚至若干不平等條約試圖建立有利於其的互動關係，中國雖因進入明朝末年的混亂期而有法有效執行其體系平衡者的職責，但因此際到達東亞的西方諸國也缺乏實際上壟斷貿易的能力；²⁴因此，雖然它們次第在印度洋、東印度群島與南中國海攫取了許多箝制航路的戰略性港口，對此區行為規範造成某種質變的實際效果，但我們還是得這麼說，這些擴張行動根本上仍未能動搖傳統的東亞國際體系內容。

三、第二波：工業革命與帝國主義（18-19 世紀）

15 世紀瀰漫整個義大利半島的文藝復興運動，與 16 世紀初起自日耳曼地區的宗教改革風潮，乃是促使歐洲從中世紀長期睡眠狀態甦醒的重大歷史發展因素。由於基督教會權威受挫，使 17 世紀的歐洲在政治與經濟面都有著關鍵性的變化產生：前者意涵著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出現，而後者是指因為科學革命爆發而對經濟「舊制度」（ancien regime）所做的挑戰，至於其結果則為導出重視利潤積累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以及由於國家間經濟競爭太過激烈，因此出現要求政府保護私人部門利益的重商主義（mercantilism）。相關發展從當時荷蘭駐巴達維亞貿易代表科恩（J. P. Coen）的一段話中，頗能夠看出些端倪：

²²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Vol.1, p.51.

²³ D. R. SarDesai 著，蔡百銓譯，《東南亞史》（台北：麥田出版公司，民國 90 年），頁 103-104。

²⁴ see Kristaf Glamann, *Dutch-Asiatic Trade, 1620-1740* (Hague: Nijhoff, 1958) .

各位從經驗上應已得知，想要在亞洲從事貿易，必須在各位的武器保護下進行，……所以，我們不能在不戰爭的狀況下進行貿易，也不能在沒有貿易的情況下進行戰爭。²⁵

由於遠洋貿易同時為商人階級與執政君王帶來經濟利潤與政治威望，兩者便以利益互補的型態進一步的結合起來。更甚者，從 16 世紀到 17 世紀連綿不斷的霸權爭奪戰（先是西荷爭霸，接著是英國挑戰荷蘭霸權，最後是法國與英國所展開的全球殖民競爭），更有助於維繫國家活力，並推導出一波波的對外擴張浪潮。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波全球化浪潮中，包括非洲西岸與美洲東岸的大西洋區乃是各強國角力的主要場所，而蔗糖與奴隸貿易是其利益重點，至於東亞則暫時居於邊陲地帶。

儘管如此，亞歐的貿易內涵仍在 17 世紀末期出現緩慢的轉變，亦即由香料競賽轉而為設法取得包括印度紡織品、中國與波斯的絲綢、中國藝術品（漆器與瓷器）以及茶葉等奢侈品；²⁶其原因或許是用以滿足得利於大西洋貿易之歐洲貴族與新興商人階級的虛榮要求。不過，一方面受限於尚未成熟的遠洋打擊能力，加之以 17 世紀中葉左右中國滿清政權與日本德川幕府的地位鞏固，歐洲國家乃暫時缺乏繼續擴張利益的能力，僅能以佔領貿易據點的方式，例如英國在加爾各答與馬德拉斯、西班牙在馬尼拉與台灣北部（後遭荷蘭逐出）、荷蘭在麻六甲、巴達維亞與台灣西部（後被鄭成功所驅逐）、葡萄牙在澳門等，來維持與亞洲的聯繫，並透過要求與某些國家進行有限而「屈辱」的貿易來往（例如在中國的廣州與日本的長崎）。在此必須一提的是，相較於商業層次的弱勢，歐洲的傳教士卻在 16 世紀與 17 世紀之交，為東西學術交流貢獻良多；但一方面由於與東方信仰（特別是祖靈崇拜傳統）發生激烈衝突，再加之以經常涉入政治紛爭（例如康熙末年的奪嫡鬥爭與德川政權初期的內部問題），終於在壓錯寶效應的發酵下，遭到新政權的廣泛查禁，從而也終結了東西方間大

²⁵ 引自 David S. Landes 著，汪仲譯，《新國富論》（台北：時報出版公司，民國 88 年），頁 144。

²⁶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0), Vol.2, p.273.

規模的文化交流活動。²⁷

東西文化交流中斷顯然是自達伽馬繞越好望角以來，亞歐關係史上第二個最重要的轉捩點；其重點並非是東亞停止對於外來文明的吸收，而是由於禁教與選擇性交往的對外政策，致使東亞主要的平衡者中國無法繼續獲得維持秩序所必要的充分資訊，這使它既缺乏「知彼」的情報蒐集工夫，也難以做出理性的外交回應。至於出現在 18 世紀末期的「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 則更徹底扭轉了其間的關係。

作為亞歐關係史上第三個歷史轉捩點，關於工業革命對兩洲互動內涵的影響，我們可從在此之前的雙邊貿易特色談起。當歐洲人自 16 世紀起開始其對亞洲的貿易進程後，便遭遇到一個難以突破的困境，亦即歐洲商人想盡辦法要在亞洲找到銷售貨品的市場，來交換亞洲產品運回歐洲，以減少稀有之通貨用貴金屬（金銀）的外流，但相關努力一直到 18 世紀末期前始終沒有成功；²⁸其原因可能是由於亞歐間物價結構或生產力差異所導致，²⁹結果迫使歐洲人只能以港口商站為據點，向過往的亞洲商船徵稅，或進行東亞區域內貿易來彌補其收入逆差。但就在中國的統治者決定繼續走自己傳統道路時，發生在西歐的巨變卻已暗示著風暴的即將來臨。³⁰

對於眾說紛紜的工業革命起因，在此不擬贅述。我們必須知道的是，相較於東亞國家對於第一波全球化浪潮的抗拒及維持體系穩定的能力，它們在這一波行動中非但弱勢盡露，而且很快地便土崩瓦解。在過程中，正如華勒斯坦所形容的：

合併到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中，從來不是那些被合併者的主動所致。此進程源自世界經濟體系擴張其疆界的需要，……像合併這樣大規模的社會過程也不

²⁷ Hosea B. Morse and Harley F. MacNair, *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 1931), pp.27-28 & 37-43.

²⁸ 張彬村，「十六到十八世紀華人在東亞水域的貿易優勢」，收於《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三輯》（台北：中央研究院，民國 77 年），頁 348；關於白銀問題，可參考全漢昇，「明清間美洲白銀的流入中國」，收於《中國經濟史論叢》（香港：新亞研究院，1972 年）。

²⁹ see K. N. Chaudhuri, *The Trading World of Asia and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London: Mcmillan, 1978), pp.156-157; Philip Curtin, *Cross-Cultural Trade in World History*, p.149.

³⁰ William McNeill, *op. cit.*, p.905.

是個突如其來的現象，它們產生於持續進行的活動潮流中。³¹

這段話首先闡釋了全球化進程的長遠歷史背景，同時也說明了由歐洲所發起挑戰性行動的特徵。在這個階段中，歐洲擴張無論在「內涵」或「形式」上都有了明顯的變化。在內涵方面，18世紀末期以前，歐洲社會內部的多數消費需求都是由自己滿足的，國際貿易只在提供少數富有階層所需的奢侈品；但工業革命使新一波資本主義經濟的「……市場不斷擴大，因為對利潤的追求帶來競爭，刺激著每個公司進行積累並擴大規模，到處搜求廉價原料和出售更多商品的機會。」³²再加以革命為生產過程帶來標準化與加速的效果，由此產生的供過於求現象更驅使歐洲商人瘋狂地對外擴張，以避免為解決需求不足問題所帶來的經濟緊縮與景氣蕭條。

至於在形式方面，由於工業革命所導致歐洲與東亞在軍事實力上的顯著落差，也鼓勵前者在19世紀中期後加速其擴張進程；比起歐洲國家在19世紀之前以「點」（戰略港口）與「線」（關鍵航道），加上透過「不平等條約」來保障貿易特權的型態，此後它們則多半轉而憑藉優勢武力，進行「變相佔領」或「實際征服」等類似的行動。如同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所言：

一個由已開發或發展中資本主義核心地帶來決定步調的世界經濟，非常容易變成一個由「先進地區」支配「落後地區」的世界，簡言之，也就是變成一個帝國的世界。……這種由一小撮國家瓜分世界的情形，堪稱是地球上日益分為強與弱，進步與落後等趨勢的最壯觀表現。……在1876-1915年間，地球上有一四分之一的土地是在六、七個國家間被分配或再分配。³³

就在這種情況下，到了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除了日本以及中國和暹羅這兩個名義上獨立的國家外，英國以印度為基地，將勢力往東伸入緬甸，並以

³¹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9), Vol.3, p.129.

³² Samir Amin, *Unequal Development: An Essay on the Social Formation of Periphery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6), Chapter 3.

³³ Eric Hobsbawm 著，賈士蘅譯，《帝國的年代》（台北：麥田出版公司，民國86年），頁82-

香港作為控制中國市場的轉運站；法國以越南為基地，向西邊侵入老撾與柬埔寨，並逐步滲透中國西南內地（兩廣與雲貴）；荷蘭繼續控有東印度群島的大多數地區；西班牙在 1898 年將菲律賓群島移交給美國；而後起的日本則據有朝鮮半島和台澎列嶼。總之，東亞傳統國際體系在這波全球化浪潮的衝擊下已全然崩潰，歐洲式的國際行為習慣成為主導新時代的新規範，而東亞經濟結構也成為以歐洲為主之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下的被剝削者。自此一直到 20 世紀初期，此區國家不僅紛紛失去獨立的主權地位，也始終未能理性地基於本土利益來從事經濟建設，至於其結果則是在積累怒氣的同時，埋下整個世紀多數期間的動亂因子。

四、第三波：解殖民化與獨立風潮（20 世紀前期）

所謂「帝國主義」(imperialism) 的擴張型態雖存在已久，但是成為專有名詞卻是到了 1870 年代之後；至於其後續影響更具全面性，正如霍布斯邦所繼續說明的：

帝國年代不僅是個經濟和政治的現象，也是個文化現象。地球上少數「已開發」地區的征服全球，已藉著武力和制度，以及藉著示範和政治轉型，改變了人們的意象、理想和希望。³⁴

從某個角度看來，由於工業技術不斷進步翻新，再加上歐洲國家間的激烈競爭，於是國際貿易乃逐漸被視為是個「零和競賽」(zero-sum game)，³⁵亦即某些國家的得利必代表另一些國家的損失；為保障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不斷地擴張海外市場便與國家的生存利益被劃上等號。更甚者，由於從下而上之民

85。

³⁴ 同前註，頁 108。

³⁵ Ankie Hoogvelt,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stcolonial World: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7), p.4.

主力量的強化，新興的商業貴族也將國家作為「保護者」而驅使其進行無止盡的遠征；在這種情況下，以歐洲為主的 19 世紀全球體系核心，在 1800-1878 年間乃將控有全球土地面積的比例由 35% 提高到 67%，此比例在 1875-1914 年間又進一步升高到 85%。³⁶ 這種權力高度集中的型態誠然凸顯出已臻霸權顛峰之歐洲的國際地位，卻也反映出其他地區的受制與難以翻身。

相對於帝國主義浪潮，多數東亞國家由於缺乏抵禦能力，大都陸續淪為歐洲國家控制下的半獨立保護國，甚至是直轄殖民地。不過仍有少數國家在民族主義的驅使下，接受了西方價值觀，並認為只有採取主動歐化的途徑，透過工業化來翻轉傳統經濟結構，才能夠挽救國家於危亡邊緣；類似行動例如像中國的「自強運動」（1960-94）與「維新運動」（1898），日本起自 1868 年的「明治維新」，朝鮮在 1870 年代的「開化黨改革」，以及秦王拉瑪四世（1851-68）與拉瑪五世（1868-1910）的西化運動等。但除了日本之外，這些舉動大多終歸於失敗；主要原因一方面來自國內政局的長期動盪不安，其次則是外國勢力的持續滲入。總之，東亞傳統體系在這波全球化浪潮中已全然遭到摧毀，取而代之的是種缺乏獨立自主權的低階層性地位；在這種狀態下：

……殖民統治逐漸損害當地的經濟基礎，透過引進有利於統治團體的經濟體制，被征服的殖民地人民被迫陷入奴役狀況、奴隸地位或依賴困境中。³⁷

上述不平等的經濟發展不僅埋下日後南北問題的遠因，同時也引發了殖民地人民希望尋求獨立地位的民族主義風潮，³⁸ 只不過由於統治者與支配者的實力懸殊，因此短期間並無法解決問題。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資本主義全球體系於 19 世紀末邁向其發展巔峰時，卻也導致帝國主義國家間最激烈的鬥爭，最後並引出兩次的世界大戰；³⁹ 至於其緣故則來自於帝國主義目標的矛盾，亦即

³⁶ H. Magdoff, *Imperialism: From the Colonial Age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pp.29-35.

³⁷ Ted Robert Gurr and Barbara Harff, *Ethnic Conflict in World Politic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4), pp.15-16.

³⁸ G. Barraclough,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History* (London: Macmillan, 1966), p.167.

³⁹ Thetonio Dos Santos 著，毛金里等譯，《帝國主義與依附》（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 年），頁 13。

耗費龐大成本進行擴張之目的本在尋求更大的市場，但實際上它們所控制者卻都是些最多僅具未來性的低度開發國家，至少就現階段而言並無法有助於舒緩歐洲國家的工業供給壓力，反而導致其內部進一步的惡化競爭。

無論如何，特別是第二次大戰可說是亞歐關係史上的第四個轉捩點。由於舊殖民母國在歷經數十年的軍備競賽與戰爭消耗後，被迫將有限的經濟資源用於國家重建，因此無暇顧及原有殖民地；相對地，這對東亞的民族主義者而言則不啻是個難得的機會。首先是朝鮮與台灣在日本戰敗後的解殖民化，其次是印度在 1947 年的脫離英國，終結了有史以來最大的次大陸殖民統治，再者是荷蘭在 1949 年的放棄東印度群島主權，而法國則在 1954 年後陸續退出對中南半島的控制，至於菲律賓也在美國的扶助下建立民主政體；這些都象徵著歐美勢力在亞洲的暫時退卻。事實上，正如我們在前面所曾提及的，經濟剝削、社會地位低落，再加上政治參與途徑的緊縮，早就在東亞各殖民地引發民族主義式的排外抗爭，其中著名者包括緬甸的昂山(Aung San)、越南的胡志明(Ho Chi Minh)、老撾的佩差拉(Phetsarat)、泰國的帕儂榮(Pridi Banomyong)、印尼的蘇卡諾(Sukarno)與菲律賓的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等人。⁴⁰上述領導人不僅自殖民時代末期起就發起抗爭運動，在獨立後重組國家的過程中也都扮演著關鍵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相較於前兩波全球化過程中，以歐美國家為首的經濟性擴張活動，這波浪潮雖起因於核心領導區的崩潰，東亞各殖民地國家仍扮演相當積極主動的角色，至於其內涵與立即影響則是「意識型態性」的，亦即主張「民族自決」(national determination)與「民主化」(democratization)。換言之，由此所建立的新興國家至少在建國初期或其後的一定時期內，多傾向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並在表面上普遍採取了民主共和政體，從而構成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歸納所謂「第二波」民主化浪潮的一部份；但正如杭氏所言：

有相當數量的新獨立國家雖是以民主國家身分起步的，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只有較少數的國家維持了民主制度。⁴¹

⁴⁰ 參考張錫鎮著，《東南亞政府與政治》(台北：揚智出版社，民國 88 年)，第一章。

⁴¹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st Twentieth Century* (New

大體言之，相較於在第一波全球化中的維持傳統，以及在第二波中的全面崩潰，東亞國家在這波浪潮中的態度則是兩者兼備：一方面在國家主權方面順應民族獨立風潮，⁴²甚至利用國際途徑（例如聯合國或不結盟運動）與舊殖民國家形成對抗衝突態勢，但是在經濟發展上卻仍舊接受西方的主流思想，亦即唯有進行現代化（modernization）或工業化（industrialization），才能提高國家的發展程度，以達到追趕先進國家與鞏固國家生存之目的。從某個角度看來，這等於是將自己投入全球化洪流中的過程；透過發展經驗的學習，東亞地區的新興國家也首度主動接受了西方式的價值觀。

五、第四波：科技革命與民主化（20世紀末）

從歷史上看來，在東亞長期居於支配性地位的乃是中國；對此，令史家們深感興趣的乃是其以文化導向所形成的強大內聚力，亦即所謂「儒家傳統」；它使「中國」由地理名詞昇華到了文化層次。帕深思（T. Parsons）認為：「在文化發展的相關階段裡，中國的物質環境比較起來實優於（西方的）中古及近世時期，然而他們文化裡的經濟倫理皆直接與此一發展相衝突。」⁴³此看法事實上呼應了韋伯（Max Weber）的意見，後者認為與西方相較之下，關鍵在於「儒教的理性主義是去理性地適應於世界，而清教徒的理性主義是去理性地支配世界。」⁴⁴韋伯認為儒家的「君子不器」概念與長期「重農抑商」政策乃是阻礙並抑制資本主義產生的主因，從而也使中國在全球競爭中逐步落於歐洲之後。中國的停滯發展不僅改寫了東亞的歷史，⁴⁵並使鄰近的日本得以在此區大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49.

⁴² Joseph Franke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Changing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221.

⁴³ Talcott 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61), p.512-513.

⁴⁴ Max Weber, op. cit., p.315.

⁴⁵ see Denis Twitchett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Late Ching*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3.

幅擴張其政經影響。⁴⁶正如前述，直到 20 世紀中期為止，東亞真正獨立的國家除了中國與日本之外，便只有也具備典型「東方專制」(oriental despotism) 政治模式的暹羅（後改稱泰國）。

在經濟方面，本區多數地域長期處於各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統治之下，從而使其經濟結構充滿依賴與邊陲性的特色；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康明思 (Bruce Cumings) 所言：「……如果東亞有個奇蹟的話，它並不是從 1960 年代才開始的；認為東亞奇蹟起自 60 年代的看法明顯地缺乏對歷史的關照。」⁴⁷在此所謂歷史關照是指，由於日本自 1930 年代起便逐步將其夕陽產業轉移到台灣與朝鮮半島這兩個殖民地，從而塑造了所謂「雁型」(flying geese) 模式的雛型。⁴⁸至於在政治方面，東南亞的殖民母國為穩定控制廣大地域，通常採取結合當地菁英並在複雜種族間進行「分而治之」的統治策略，⁴⁹至於在東北亞的日本則帶有較強的高壓氣息。

上述各種特徵在二次大戰結束後都有了重大的轉變。其中，東亞地區一直到 1950 年代中期間，陸續出現了菲律賓 (1946)、馬來西亞 (1947)、印度尼西亞 (1949)、緬甸 (1950)、南北韓 (1948)、南北越 (1954)、寮國 (1954) 與柬埔寨 (1954) 等 10 個新興或分裂國家。這些國家雖普遍建立起民主體制，但冷戰在 1950 年代的爆發卻使東北亞首當其衝，除朝鮮半島成為兩大集團對峙前線外，日本被注入美援以作為對抗共黨擴張的基地，而東南亞則掀起一股排外民族主義風潮。總的來說，東北亞政治發展充滿了國際干預的影子，而東南亞的發展則在較大層面上反映出社會族群的複雜及其衝突性；無論如何，脆弱而不穩定的經濟與社會狀況並未能替新民主奠下良好基礎，反而帶來了一連串的威權統治者。⁵⁰

⁴⁶ see Karalvan Wolferen, *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 People and Politics in a Stateless N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9); and Clyde Prestowitz, *Trading Places: How We Allowed Japan to Take the Lea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8).

⁴⁷ Bruce Cumings,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ast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Industrial Sectors, Product Cycles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8(1984), p.3.

⁴⁸ 所謂雁形模式起於 1930 年代日本學者 Kaname Alamatsu 的說法，參考 Hans C. Blomquist,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Westport: Praeger, 1997), pp.13-29.

⁴⁹ D. G. E. Hall, *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London: Macmillan, 1970), p.352.

⁵⁰ 此區曾在位的威權統治者包括台灣的蔣中正 (1949-1975)、中國大陸的毛澤東 (1949-1976)

比較突出的表現是在經濟方面：這些新國家在戰後普遍透過國營企業控制國家生產；⁵¹其後藉由將經濟策略轉為以「出口導向」為主，進一步造就了所謂的東亞「經濟奇蹟」。自 1960 年代以來，以「四小龍」（Four Tigers, 台灣、香港、新加坡、南韓）和「新小龍」（泰國、印尼、馬來西亞）為主的亞洲新興經濟體（ANIES），其經濟成長率不僅比其他東亞國家高出一倍，比拉丁美洲國家高出 2 倍，也比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高出 5 倍，可說是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速的一群國家。⁵²非但如此，這群國家在達成經濟高度增長之餘，同時在國民所得分配上也維持著一定的均衡性，可說相當難得。巴拉薩（Bela Balassa）認為此種現象乃根源於東亞國家激勵性制度的穩定，政府的有限干預，有效的勞力與資本市場，以及對私有資本的依賴。⁵³進一步言之，這種源自於「新古典自由主義」的理論還認為，東亞的發展可追溯至西方國家的殖民擴張，因為歐洲人除獲取殖民利益外，事實上也將其成功的經驗傳給其他的民族。⁵⁴當然，對於東亞經濟增長的解釋並不只新古典主義一途；另一批「文化主義者」則認為，亞洲經濟的躍昇主要是東亞價值與歷史制度使然，其經濟發展可說是大幅修正而非僅是重現西方模式而已。⁵⁵換言之，東亞自有一套因應世界變局的獨特文化系統，例如強調合作和諧與重視人際關係等，這些被認為來自傳統儒家教條的特色都被視為觀察東亞發展重點。此外，來自「國家中心」學說的論點也以東亞為例，而挑戰了傳統的西方新古典價值觀；例如透過個案

與鄧小平（1978-1997）、北韓的金日成（1948-1994）、南韓的李承晚（1948-60）、朴正熙（1963-79）與全斗煥（1980-88）、印尼的蘇卡諾（Ahmed Sukarno, 1945-1966）與蘇哈托（T.N.J. Suharto, 1966-1998）、越南的胡志明（1945-1969）、馬來西亞的東姑拉曼（Tunku Abdul Rahman, 1957-1963）、新加坡的李光耀（1959-1990），其他還有一些獨裁者與軍事政變領袖。（括號內年代為其在位期間。）

⁵¹ 宋鎮照，「國營企業之政治經濟分析：東亞與拉丁美洲新興工業化國家之比較研究」，*成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篇），第 27 卷，頁 103-116。

⁵² 這 7 個國家在 1960-1990 年間，GDP 平均增長率危 5.5%，參考王彩波著，《經濟起飛與政治發展》（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 年），頁 62-63。

⁵³ Bela Balassa, "The Lessons of East Asian Development: An Overview,"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36(1988), pp.286-288.

⁵⁴ "The Triumph of the East? The East Asian Miracle and Post-Cold War Capitalism," in Mark T. Berger and Douglas A. Borer, eds. *The Rise of East Asia: Critical Visions of the Pacific Century*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p.260-262.

⁵⁵ see *ibid*, pp.267-268, and Gilbert Rozman, "The Confucian Faces of Capitalism," in Mark Borthwick, ed. *Pacific Centu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2), pp.310-318.

研究便可發現，不僅在東亞，同時在多數發展中國家裡，政府都扮演者推動發展甚至塑造市場的關鍵性角色。⁵⁶

不過，在爆發經濟潛力的同時，民主的進展卻無足可觀；正如杭廷頓所認為的，從 1960 年代到 1980 年代初，此區國家（以南韓與台灣為例）儘管在經濟與社會方面有著深刻的轉變，但在要求政治民主化的壓力方面卻比拉丁美洲多數國家小得多；其原因首先可能在於儒家傳統中強調層級結構、領導權威與社群忠誠的結果，其次則是所得分配的較為平均也有助於減緩民主要求。不過在 1980 年代中期後，由於經濟發展已達要求擴大政治參與度的臨界點（主要是指中產階級的擴大），迫使兩國開始了民主化的進程；⁵⁷事實證明，東亞地區傲人的經濟成就的確為其漸進式的民主發展鋪出一條坦途。

無論如何，不管東亞在二次大戰後的發展如何具有其獨立特色，由於國際經濟局勢因蘇聯解體與冷戰結束而有了極其重大的變化，軍事對抗的降溫直接導致全球資源的重新配置；對於同時而來的「經濟全球化」效應，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便曾大膽進行過「三分天下」的預言。⁵⁸正如列希（Robert B. Reich）所言：「在未來，純屬於一個國家的產品、技術、公司或工業將不復存在。」⁵⁹換言之，所有國家的生產系統都將無可避免地被逐步吸納進世界性的經濟製造體系當中；非但孤立於國際之外是不可能的，從另一個角度看來，更主動地加入這股潮流似乎才是各國政府的最佳對策。就事實層次而言，東亞各國向來便對資本流動、國內金融機構國際化，以及外資進入途徑加以控制；但上述情況使這些管制都遇到了嚴重挑戰。在這股浪潮下，一方面由於（特別是電訊等）科技的進步已導致地球村雛型的出現，再者，東亞國家的產業升級也有賴於外資的進一步挹注，因此各國紛紛主動或被動地採取「自由化」（Liberalization）政策來因應。其結果雖因國際資本的大量流入

⁵⁶ Akio Hosono, "The Roles of State and Market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East Asian Miracle," in Hosono and Neantro Saavedra-Rivano, eds.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East Asia and Latin Americ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pp.17-35.

⁵⁷ Samuel P. Huntington, op. cit., p.75.

⁵⁸ 所謂「三分天下」指的是美元、日圓和馬克三個經濟集團；參考 Terry L. Deibel, "Strategies before Containm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6(1992), p.101.

⁵⁹ Robert B. Reich, *The Work of Nations: Preparing Ourselves for 21st Century Capi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2), p.3.

致使其維持了經濟繁榮，甚至出現所謂「泡沫經濟」現象，但由於這些資本多著眼於短線金融市場操作，最後終因美元升值而在 1997 年引爆金融危機。⁶⁰

值得注意的是，一股席捲全球的「第三波」民主化潮流也在此時橫掃許多東亞國家，例如東北亞的南韓與台灣，東南亞的菲律賓、印尼、泰國與緬甸等都出現顯著的威權崩解過程。民主化運動誠然凸顯出這些國家的群眾要求，或其社會發展方面的成熟度，但就其後續影響面來看，更需一提的或許是因此而與歐美國家在意識型態層次的進一步接軌，以及由於國家政策獨立性下降導致自我保護能力削弱，使得它們對經濟全球化壓力愈發缺乏抵抗能力等，這些都是我們必須進行深入後續觀察的。

⁶⁰ Callum Henderson, *Asia Falling? Making Sense of the Asian Currency Crisis and its Aftermath* (New York: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1998), Chapter 3.

六、結論

綜觀數世紀以來「全球化」浪潮對東亞地區所造成的衝擊，我們當可清楚地發現其所造成的深層影響，亦即「轉變」(transformation)乃是其間的發展主軸。在此，本文最後將試圖經由對這數波浪潮之過去、現在，與未來的進一步觀察，抽絲剝繭地釐清更多的觀念。

首先在「過去」方面，我們所注意到的乃是全球化的「動力來源」，亦即所謂的西方（特別是西歐與北美）世界。由於自 16 世紀以降，相對於世界上其他地區，西方逐漸鞏固並拉大其文明程度的領先差距，因而也使其成為這股全球化的先驅力量。值得一提的是，擴張本身原來就具有一定的文化霸權意味，而類似行動在過去也並非未曾發生過，例如西方的羅馬帝國與東方的中華帝國等皆是，但影響如此深者倒是前所未見。相關發展在 19 世紀末期達到第一次的高潮階段，正如霍泊桑 (Hobson) 所云：

即使為求方便而把 1870 年視為帝國主義的開端……但這項運動顯然直到 1880 年代中葉……差不多 1884 年左右，才達到巔峰狀態。⁶¹

就在這種情況下，西方以外的世界上絕大多數區域不僅皆承認了其文化霸權，同時也由於降服在其政治與經濟霸權的威望下，從而亦失去了獨立自主的國際地位；其影響迄今未絕。

其次在「現在」方面，我們所關切的乃是全球化的「後續影響」，亦即所謂挑戰與回應的過程。就像湯恩比 (Arnold Toynbee) 所說的：

以科學的語言而論，我們可以說：自外侵入的因素，是在提供一種計算精確的刺激，以喚起被侵入系統中最大的創造潛力。⁶²

在此所指的是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重要過程，也就是基於擺脫受壓抑的

⁶¹ J. A. Hobson, *Imperialism* (London, 1983), p.19。

⁶² Arnold Toynbee 著，陳曉林譯，《歷史研究》(台北：遠流出版公司，民國 80 年)，頁 204。

企圖，從而導出新的發展動力。對此，在 19 世紀以來的東亞地區發展歷程中可謂一覽無遺。正如前述，部分東亞國家自第三波全球化歷程以來，便開始了大規模學習西方典範制度的運動，儘管成功者不多，但隨著歐洲勢力在 20 世紀中期的撤出，重獲生機的東亞國家乃萌發了另一股改革浪潮，至於結果則是經濟的普遍蓬勃發展。值得注意的是，關於東亞締造如斯成就的討論，雖然文化主義論者頗強調所謂「東亞價值觀」的重要性，但實則其中沿襲者有限，而創新者則所在多有。更甚者，對於東方式（或日本式）管理技巧或「東亞奇蹟」的研究，則顯然已使東亞逐步擺脫落後與全盤學習者的角色，從而為新一代全球文明的締造做出貢獻。

至於在「未來」方面，我們則嘗試不自量力地，為東亞在新世紀中的可能發展做些預測。儘管米達爾（Myrdal）曾在 1960 年代初期對亞洲未來做過相當令人喪氣的預言，⁶³但世界銀行在 30 年後所作研究報告中，對此區發展所冠上的「東亞奇蹟」一詞，⁶⁴則顯然扭轉了人們對此區的評估觀點。儘管如此，亞洲並非未付出代價，而其中最重要的則是環境問題：在過去 30 年中，東亞失去了一半的森林與魚群，將近三分之一的土壤品質嚴重惡化，而空氣中二氧化硫含量也比拉丁美洲與非洲多出 50%。⁶⁵除了令人擔憂的環境問題外，在國外因素方面，正如結構主義者所言，由於舊殖民勢力（歐美國家）依然佔據了全球經濟體系中的支配地位，因此東亞國家完全的經濟獨立性仍不可得；⁶⁶至於在國內部分，由於長期經濟穩定發展所帶來的人口增長，與更大的社會轉型及結構調整壓力，也形成 1990 年代普遍民主化運動的重要背景；最後，在 1997 年所爆發的廣泛金融財務危機，更可謂致命一擊。從這些角度看來，東亞國家儘管在過去半個世紀中，有過輝煌而引人注目的成長紀錄，但第四波全球化浪潮所帶來的外部競爭壓力（科技革命）與內部調整壓力（民主化），無疑都讓其未來充滿了變數；這也是我們應持續予以觀察的。

⁶³ G. Myrdal, *Asian Drama: An Inquiry into the Poverty of Nations* (Allen Lane: Penguin Press, 1963) .

⁶⁴ World Bank, *The East Asian Miracle: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⁶⁵ Colm Foy and David O'Connor, eds. *The Future of Asia in the World Economy* (Paris: OECD, 1998) , p.201.

⁶⁶ Ankie Hoogvelt, op. cit. pp.29-30.

Glob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ast Asia

Tsai, Tung-Chieh

Abstract

Since the “Wave of Self-determination” in 1950s, not only did most East Asian countries regain their independent status, but they owned the distinguish economic achievements, and even attended the process of so-called “Globalization”. In this paper, we will at first explain the interrelated ideas of “Globalization”, then analyze how could East Asian countries use the forms such as “Europeanization” or “Capitalization” to join to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We especially lay emphasis on the discovery of new seaway, the emergence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wave of de-colonialism, and the influence of technical revolution and 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Of course, wha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here is to predict the future of East Asia.

Keywords: East Asia, Globalization, Capitalism, Industrial Revolution, World System